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周爾銓
張雨林編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主 編

周爾銓 張雨林

副主編

吳大聲 居福田 母青松 張良銘

學術指導

費孝通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周爾鑾 張雨林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608 8 (中文繁體字版)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周爾璽 張雨林編

中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各地城鄉協調遂由於資源狀況、社會經濟結構、交通條件各異，因地制宜，各有特徵。一九四九年以後，城鄉發展共有多少種模式，學術界至今並沒有定論。本書對於模式的研究，可說是一新的嘗試。

本書分兩編：第一編調查、討論了蘇南、珠江、溫州、寶雞、常德、民權、耿車等七種模式的形成條件、發展過程、特點以及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第二編在七種模式調查結果的基礎上，探討城鄉發展的各種關鍵問題，比如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村工業化、現代化，鄉鎮工業與城市工、農業，小城鎮建設，城鄉文化交流等等，從個性出發探索個性中所包含的共性。

本書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進行的「七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的研究成果。

社會與思想叢書

甘陽 崔之元編

中國社會與國家的重新結構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

黃宗智

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

費孝通

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

周其仁編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1978—1989（上卷）

周其仁編

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1978—1989（下卷）

鄧英淘等

中國農村金融的變革與發展，1978—1990

周爾鑒 張雨林編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周其仁編

中國區域發展差異調查

潘乃谷 馬戎編

中國邊遠地區開發研究

李銀河

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日期 姓名 借書證

40750293

301

155

A0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錄

導 論

- | | |
|--------------------------|----|
| 一 我國城鄉關係的歷史回顧 | 1 |
| 二 實行改革、開放後我國新型城鄉關係的確立和發展 | 13 |
| 三 適合我國各地不同情況的多種模式 | 21 |

第 一 編 因地制宜 多種模式

第一章 蘇南模式 24

- | | |
|-------------------|----|
| 一 蘇南模式的提出及其內涵 | 24 |
| 二 蘇南模式的形成與基本特點 | 27 |
| 三 蘇南模式的發展歷程及其運行機制 | 36 |
| 四 蘇南模式與農村社會全面進步 | 45 |
| 五 蘇南模式的改革與完善 | 54 |
| 六 蘇南模式的發展趨勢 | 64 |

第二章 珠江模式 68

- | | |
|--------------|----|
| 一 珠江三角洲與珠江模式 | 68 |
| 二 珠江模式的基本經驗 | 72 |

目錄

三 珠江模式的形成條件與前景展望	89
第三章 溫州模式	94
一 溫州模式的形成	95
二 溫州模式的內涵和特徵	104
三 溫州模式的新發展	111
四 溫州模式的地位和作用	119
第四章 寶鷄模式	130
一 寶鷄模式的產生條件	130
二 寶鷄模式的實踐形式	141
三 寶鷄模式的主要特點	153
四 寶鷄模式的認識和思考	161
第五章 常德模式	171
一 常德模式的內涵和形成條件	171
二 常德模式的發展過程和特點	174
三 常德模式的作用與內在聯繫	178
四 常德模式發展的制約因素與基本對策	182
第六章 民權模式	188
一 民權模式產生的背景	188
二 民權模式的主要內容	194
三 民權模式的基本特徵	198
四 民權模式的效應	207
第七章 耿車模式	214
一 耿車模式的產生	214
二 耿車模式的特點	218
三 耿車模式的成就	221
四 耿車模式的基本經驗	222

第二編 城鄉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研究

第一章 從七種模式看城鄉協調發展問題	226
一 七種發展模式的特點及其代表意義	226
二 農村改革與城鄉互動新形勢的出現	232
三 城鄉協調發展是重要的發展戰略	238
第二章 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	242
一 發展鄉鎮工業是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主要途徑	242
二 發展鄉鎮工業與實現農業現代化	247
第三章 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業的協調發展	249
一 鄉鎮工業與城市工業的協調發展	249
二 鄉鎮工業與農業的協調發展	258
第四章 小城鎮建設和城鎮體系優化	263
一 小城鎮和城鄉社區網絡建設	263
二 優化城鎮體系和建設重點小城鎮	265
第五章 城鄉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建設	272
一 城鄉文化交流	272
二 城鄉精神文明建設	277
結束語	280
後 記	費孝通 283

導論

我國的新型城鄉關係

張雨林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並無現成的經驗可以搬用，只能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城鄉關係是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回顧我國建國以後城鄉關係的發展變化史，我們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有的教訓還對全局造成過深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借鑒國際上的成功作法，開拓新型城鄉關係，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本書《導論》旨在回顧我國建國以來在城鄉關係方面所走過的道路，概要地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新鮮經驗，為全書提供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宏觀背景。

一 我國城鄉關係的歷史回顧

我國革命的性質，決定了我們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體。建國四十多年的經驗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證明，我國的國體符合我國的國情，順應了歷史潮流，是我們的立國之本。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深刻地總結了我國的歷史經驗，把堅持這樣的國體、完善國體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列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之首。從這樣的國體出發，同時考慮到我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情，決定了我國不能

走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走過的城鄉對立的老路，而必須堅持城鄉協調發展的道路，既肯定城市的重要性，又使農村從數千年的貧困和愚昧狀況中解脫出來，使工農聯盟得到鞏固和發展。對此，我國從建國伊始就是十分明確的。

我國最早獲得解放並且具備大城市的地區是東北。當時，在東北局工作的重要理論家張聞天同志首先接觸並研究了城鄉關係問題，明確提出了新中國的城鄉關係「同舊的殖民地的城鄉關係有根本區別」。他認為，舊的城鄉關係「是城鄉對立，城市剝奪鄉村」，而新中國則應是「城市和鄉村的關係是互助合作的關係」，「工業與農業並重，工業領導農業；工農聯盟，工人階級領導農民」。^①以後，在確立我國建國大政方針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吸收全黨的智慧，進一步提出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城市以後，決不可丟掉農村僅顧及城市，而是「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繫起來」。^②劉少奇同志在這次會上也把城鄉關係作為黨在國家建設中遇到的一個新問題，要求全黨進行研究，並且提出「要有城鄉一體的觀點」。^③工農聯盟、城鄉緊密聯繫、城鄉一體，這就是我國處理城鄉關係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十分明顯，這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城鄉發展的論斷是一致的，與我國革命的性質及革命歷程所要求的也是完全相適應的。

政權的性質可以改變社會發展的方向，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條件，但是不能脫離歷史條件，不能超越客觀的可能性

① 《張聞天選集》，第389頁。

② 《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1428頁。

③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19頁。

來提高社會發育的水平。我們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是一貧窮落後的國家，1949年全國社會總產值只有557億元，人均102.8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其中農業產值佔58.5%，工業產值佔25.1%，建築業佔0.7%，運輸業佔3.4%，商業佔12.2%。重工業只佔社會總產值的8.9%（1952年數據）。我們要盡快地建設我國的工業基礎，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同時又不能剝奪農民，而且也不允許有甚麼殖民地，更不允許去剝奪其他國家的人民，這的確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這條路子該怎麼走？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有甚麼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以後，新的路子應該是甚麼？這些就是本書所要探索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鄉關係的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49年全國解放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即從舊中國城市剝奪農村的關係向新中國的城鄉關係轉變的時期。

在經濟恢復時期，我們排除了帝國主義對我國經濟的控制和剝奪，沒收了解放以前在國內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官僚買辦資本使之歸全民所有，使我國生產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據統計，1949年，我國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為41.3%，在全部工業中所佔比重為26.3%。國營工業擁有全國發電量的58%，原煤產量的68%，生鐵產量的92%，鋼產量的97%，水泥產量的68%，棉紗產量的58%，同時掌握着全國的鐵路、電信、郵政等現代交通、通訊事業。這樣，新中國的經濟就有別於舊中國的經濟。社會主義的城鄉關係，要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通過這幾年的工作，我們已經為擁有這個基礎走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此外，新中國創建伊始，我們就建立了全國性的中國人民

銀行，統一了貨幣發行，取締了私人錢莊，將調控經濟活動的這一重要手段掌握在國家手中。同時，建立和發展了強有力的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在流通領域掌握了若干重要物資：大批的糧食，50%的皮棉，60%的食鹽，70%的煤炭。並廣泛組織了物資交流，發展集市貿易，搞活城鄉物資流通。1952年開展的「五反」運動，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非法活動，整頓了市場秩序。在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並且適當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如果以1950年的價格指數為100，1952年的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則為121.6，農村工業品價格指數為109.7。當時，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農副產品與工業產品的比價，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同志的重要文稿中已經提出：「價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農業產品比價。工農業產品比價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同農民的關係問題。」^④因此，在當時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適當提高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縮小了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同時，農村實行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免除了大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加1500億斤。加上農村副業的發展，農副產品價格的提高，地租的免除，農民生活因此有了較大的改善。通過這一系列的工作，我國舊的城鄉關係已經基本上轉到社會主義城鄉關係的軌道上來，城市剝奪農村的關係已經不佔主導地位了。

第二階段是從1953年到1957年，即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高級合作化的時期。

在這段時間內，我國的城鄉關係總的看來是在沿着城鄉協調發展的方向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

土改以後，我國的農業生產獲得較快發展。糧食產量：1949

④ 《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年），第18頁。

年爲 2263 億斤，1952 年 3278 億斤，1957 年達到 3900 億斤。1957 年比 1949 年增加了 72%。但人均佔有的糧食量仍然只達到 603 斤，還是很不夠的。土改以後，農戶普遍成了自給或半自給的個體小農，農民的糧食消費量增加，餘糧減少，糧食商品率下降。與此同時，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當時興建的大中型項目共 469 個，其中蘇聯援建的骨幹企業 156 項。城鎮人口從 1952 年的 7163 萬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9949 萬人，5 年間增加了 2786 萬吃國家商品糧的城鎮人口。糧食的社會零售量從 592.2 億斤增加到 744.7 億斤，增長 152.5 億斤。一方面是商品糧的消費量大增；另一方面是農村提供的商品糧數量不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1953 年，全國糧食的購銷差額就達 100 億斤左右。當時的農業雖然增產了，但仍是生產力水平很低的個體小生產，科技的投入也很少。按 1952 年的糧食播種面積計算，當年的糧食平均畝產只有 176.2 斤。這樣低水平的農業，與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當然很不適應。而當時爲提高我國國力打基礎的工業建設又不得不加緊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國家決定，從 1953 年開始在全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並相繼實行了棉花和油料的統購統銷。一方面，動員農民把餘糧賣給國家；另一方面，嚴禁私商進行囤積、投機活動。這是當時唯一可以採取的辦法。

當時，國家對糧、棉、油統購的價格是按照市場的正常價格，在價格上農民並不吃虧。農副產品與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在繼續縮小。如仍以 1950 年價格指數爲 100，則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從 1952 年的 121.6 上升爲 1957 年的 146.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從 1952 年的 109.7 上升爲 1957 年的 112.1。這就是說，1957 年比 1950 年和 1952 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分別提高了 46.2 個百分點和 24.6 個百分點，而農村工業品

的銷售價格指數只分別提高了 12.1 和 2.4 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我國所採取的政策，沒有對農民實行剝奪，而是在盡力之所能逐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當時的問題在於糧食太少了，不足以滿足國家工業建設的需要。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用糧比較緊，城市統銷按人定量供應，城鄉兩頭都比較緊，城鄉關係在糧食問題上顯得比以前緊張。但這是國家工業建設所需，是不得不如此的。

但是，當時統購統銷進一步發展，對許多農副產品實行派購。加之在對資改造中擴大了範圍，將一些雇員很少的小店主、獨自經營的家庭坐商和流動攤販也納入了改造範圍，這就使得城鄉之間經濟交往渠道過於單一，使本來存在的商品經濟逐步演變成高度集中統一的產品經濟，終於迫使農民逐步脫離了市場。這是我們應該總結的教訓。

1956 年，毛澤東同志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之後，提出了《論十大關係》，其中包括了處理國家和農民關係的重要原則。他要求適當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指出要注意蘇聯的教訓，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我們必須更多地處理好國家和農民的關係。」「我們……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工農業產品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⑤ 1957 年，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指出：「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個人收入這三個方面的關係，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我們要盡可能使

⑤ 《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74 頁。